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91期(民國105年3月),169-17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537頁。

戚軒銘[*]

本書作者陳懷宇曾就讀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先後為施建中與榮新江的學生；而施建中的老師王永興則為陳寅恪的學生。作者後來負笈到美，進普林斯頓大學專治中國宗教史，並同時跟隨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學習思想史，期間作者更經常與余英時及張廣達等學者交流。作者自言他關注十八世紀以來之思想史和學術史實受益於余英時的《論戴震與章學誠》，而余氏對陳寅恪之研究更直接影響到本書的研究方法（頁10-11）。[1]

一

全書除卻〈導論〉，共十一章連三篇附錄。[2]第一至七章為第一部分，主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國際語言文化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etters and Cultur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博士生

1 作者謂他有關陳寅恪與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關係的討論是借鑒余英時討論戴震與章學誠之交涉而來的。另外，作者亦謂自己研究陳寅恪著作中的西典同樣是受到余英時研究陳寅恪所引古典與今典的啓發（頁10-11、124）。有關余英時對陳寅恪的研究，見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163-176。

2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的版本並沒有收錄原來的第五、六、九、十章以及三篇附錄。然而，作者並無交代改動之由。由於所刪去的章節與陳寅恪關係不大，筆者推測作者選擇略去有關章節，以符合本書「在西方發現陳寅恪」的主題。而為完整性起見，筆者選擇使用2013年的版本進行評析。

要探討近代西方東方學和佛學對陳寅恪的影響。第一章利用哈佛的登記資料，考察陳寅恪在哈佛的生活、修讀科目、社交圈子與學術表現。第二章利用《德國東方學會會刊》來討論陳寅恪在 1921 至 1931 年間與德國學術的聯繫，並假設陳寅恪轉治唐史是受到白樂日（Balázs István, 1905-1963）和日本學者玉井是博（1897-1940）的影響。至於第三章則先指出陳寅恪在東方學上的表現並不突出，其語文能力也與西方的東方學學者有一段距離；但他的史學成就亦爲西方學界所認同，並分別在 1940 年代獲得英、美的學術榮譽。這章亦從他如何引用西典來討論其所受之西學影響。第四章則藉著陳寅恪在清華所開設的「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課程，來追溯近代西方東方學的發展軌跡。

第五至七章則圍繞佛學進行討論。第五章分析了陳寅恪在哈佛的老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旨在從哲學層面了解印度之佛學，而非從比較語言學研究梵文，並探討他在佛學上對於哈佛中國留學生的影響。第六章則追溯了現代佛學在歐、日、中三地的發展和轉型，並指出二十世紀中國的佛學研究並未能與現代學術接軌。第七章則將中國近代的佛學研究放在世界學術史的視野之中，並考察陳寅恪佛學研究在方法上，與以研究印度佛學爲主之德國東方學一樣，重視利用文獻來還原歷史；但他旨在通過對勘各種語言之佛典，來研究佛學傳入中國之過程和其對中國民族性的影響，故在主題上與德國東方學不同。

本書第八至十一章爲第二部分，主要考察赫爾德（Johann Gotti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文化民族主義對中國學術和學人之影響。第八章以陳寅恪引用德語「了解之同情」（Einfuhlung）來討論陳寅恪的學術關懷乃肇端於赫爾德的思想，包括：一、「了解之同情」，即以內心感受和體會歷史情境；二、種族文化觀，即以文化而非血緣或政治來討論種族。第九和十章討論了赫爾德在美學和民俗學方面對於近代中國的影響。作者認爲，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學人雖多視赫氏爲配角，但其影響可能比康德和歌德等知名學者更廣泛。最後一章則在強調歷史語境的框架下探討陳寅恪所謂「自由」之涵義，並將之歸納爲個

人思想的自由和精神之獨立、以及民族思想和學術之自由。

三篇附錄是利用正文中之史料所作的延伸討論。附錄一從不同方面比較哈佛中、日留學生的異同，並發現前者的學習表現似較後者爲優。附錄二則以田中斯芬（Stefan Tanaka）的《日本的東方：將過去轉化爲歷史》（*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爲出發點，簡述日本近代東洋學的發展。附錄三介紹了黑田俊雄（1926-1993）有關研究日本中古史之理論：權門體制和顯密體制。

二

本書所討論的問題非常廣泛，乍看之下似無一中心的主題。誠然，作者曾自言本書並非一開始便有一個很連貫的理論框架，而是隨著新材料和新問題的發現而逐步寫成的（頁 6）。[3]雖然如此，書名「從西方發現陳寅恪」實已透露出作者一個很重要的學術關懷：通過了解近代西方學術的發展，找出陳寅恪學術的西學淵源。陳寅恪的學術受西學的影響，這點早爲學者所注意。[4]然而，

3 本書大部分內容曾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筆者曾比勘各篇論文與本書內容，發現兩者之間主要的差異在於作者於本書中補充了大量史料、個人論點以及研究回顧。例如第八章中，陳寅恪加插了赫爾德有關理解民族之方法的原文（頁 329），另見陳懷宇，〈陳寅恪與赫爾德——以了解之同情爲中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4 期，頁 23。而在第三章中，作者在重評陳寅恪的語文能力後，補充己見認爲陳寅恪由於受德國傳統語文學之訓練，故其學術興趣在於從文獻分析歷史與文化，而非語言本身（頁 117）。另見陳懷宇，〈從陳寅恪論鋼和泰的一封信談起〉，《書城》，2009 年第 6 期，頁 18。而在第十章中，作者則補充了劉皓明有關周作人和赫爾德思想聯繫之研究（頁 385）。又見陳懷宇，〈赫爾德與周作人——民俗學與民族性〉，《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5 期，頁 54。而本書第五章中有兩處改動很值得留意。首先，作者將第一節的標題由「白璧德與早期印度學佛學學術圈」改爲「白璧德與早期東方學」（頁 204）；其次，作者於本章的結尾說明了白璧德對佛學的興趣影響到中國留學生後，補充「白璧德的具體佛教研究對中國留學生的佛教研究影響幾乎沒有」（頁 236）。此句並不見於本來的論文之中。見氏著，〈白璧德之佛學及其對中國學者的影響〉，《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5 期，頁 33、46。筆者認爲前者是爲了將白氏放在更宏觀的視野之中考察，而後者則是爲了避免誇大白氏之影響而作出改動。

4 如牟潤孫。見氏著，〈敬悼陳寅恪先生〉，收入俞大維等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輯，《談陳寅恪》（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頁 71。事實上，二十世紀初很多中國學者都有出國留學的經驗，但他們對於西學之態度卻有異同。陳寅恪雖主張引進西方之學說，但仍十分強調本

學界過去並沒有就這個問題作深入的討論。相反，如榮新江所言，學界過去所關注者是陳寅恪晚年的學行。[5]可是，陳寅恪作爲一位承先啓後之學者，若我們只知分析他的學術主張與貢獻，而不去探求其淵源的話，則往往無法全面理解其學說的眞正內涵、以及其學術之獨到處。且既然陳寅恪受到了西學的影響，那麼到底其學說受到哪些西學影響？又陳寅恪在受到西學影響後如何結合自身的立場發展出一套獨一無二之學說？以上這些問題都是非得追溯其西學之淵源而不能解決者，而本書則是回應有關問題的著作之一。

過去探討陳寅恪西學淵源者不無其人，周樑楷、張國剛、桑兵、王震邦等均曾對此作出分析。[6]但他們的研究往往都因各種原因，如篇幅、材料、討論重心等，而未能充分地回應上文所提及的問題。榮新江嘗謂：

> 寅恪先生的史學有「三變」，其學術遺產十分雄厚，不論從「西學」，

來民族之地位。而同樣留學哈佛的湯用彤（1893-1964）的態度仍與陳寅恪相近。相反，留學美國的胡適（1891-1962）則對傳統中國文化持批判之態度，並主張利用新輸入之西方文化來再造文明。而傅斯年（1896-1950）基於對傳統文化的自責，故主張應將其拋棄，並認爲只有西方學術才能稱爲學術。但無論如何，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西學影響。

5 榮新江，〈陳寅恪先生《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讀後〉，收入蔡鴻生、榮新江、孟憲實讀解，《中西學術名篇精讀．陳寅恪卷》（上海：中西書局，2014），頁 74。筆者曾搜集近年研究陳寅恪之著作，當中涉及的領域頗多。如有關其生平的有劉正，《陳寅恪史事索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有關其家族史的有劉經富，《陳寅恪家族稀見史料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13）；研究陳寅恪與其他學者之交往的有岳南，《陳寅恪與傅斯年》（長沙：岳麓書社，2014）；研究其思想與學術者有王震邦，《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1）、汪榮祖，〈史家陳寅恪的自我〉，《南國人文學刊》，2013 年第 1 期，頁 1-37。而在 2013 年所舉辦之陳寅恪學術研究研討會上，與會者亦發表了多篇涉及陳寅恪研究不同方面之論文。見鄭翔主編，《陳寅恪學術研究（2013）》（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除此之外，九州出版社在過去兩年分別出版了兩輯《陳寅恪研究》，既回顧了過去研究陳寅恪的成果，也披露了新的一手材料。見余英時、汪榮祖等著，周言編，《陳寅恪研究——反思與展望》（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值得注意者爲陳懷宇兩篇考察陳寅恪在 1940 年代在英、美得到學術榮譽經過的論文亦收入其中；又見郭長城等著，周言編，《陳寅恪研究——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然而，當中鮮有詳細分析陳寅恪西學淵源者，誠爲可惜。

6 周樑楷，〈傅斯年和陳寅恪的歷史觀點——從西方學術背景所作的討論（1880-1930）〉，《臺大歷史學報》，期 20（1996 年 11 月），頁 101-127。張國剛，〈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關於陳寅恪先生治學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識〉，收入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編，胡守爲主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210-220。桑兵，〈陳寅恪的西學〉，《文史哲》，2011 年第 6 期，頁 52-67。王震邦，《獨立與自由：陳寅恪論學》。

還是從「中學」方面，都值得我們認真分析學習，加以繼承發揚。近年來相關的論著，「西學」方面有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7]

榮氏雖爲作者碩士時候的老師，但其將陳懷宇一書視作研究陳寅恪西學方面的代表作一點亦非過譽。首先，在材料的運用上，作者比以往的學者更著重運用西文的第一手文獻。這並非謂作者只利用西方文獻來回應有關問題，而是同時通過爬梳西文以及漢文一手文獻與二手文獻來研究陳寅恪學術和其中的西學淵源，此即作者所謂之三重證據法（頁 4）。[8]他所運用之西文文獻，如哈佛大學登記手冊、《德國東方學會會刊》等都是過去學界有方法獲得，但未曾運用過的原始文獻。[9]能有效利用這些原始資料，實須歸功於作者的史識和洞見。這些材料對於陳寅恪的記錄雖然比較簡略，如《德國東方學會會刊》只列出陳寅恪是會員之一和他的登記住址，但作者卻能觸類旁通，對有關陳寅恪的記錄作歷時性的觀察，並將之與當中的其他訊息聯繫起來。加上作者同時運用到學界留意已久的漢文文獻，可謂雙管齊下。這樣一方面既呈現出陳寅恪學術成長或轉變的歷程，另一方面亦提供了解陳寅恪接觸西學的過程和途經的線索，例如本書第一章便由此還原陳寅恪在哈佛的學術經歷。

其次，作者詳細地說明了當時的世界學術史背景以及學術譜系。事實上，周樑楷與張國剛過去均曾討論到陳寅恪學說中的德國學術背景，以及他在德國時的學術譜系，但兩人因關注點不同，故只各自留意當時德國的史學發展和柏林大學任教的東方學老師的學術傾向和特點而失之一隅。加上篇幅所限，故未能對當時的德國學術背景有一整體的描述。而作者則各取其長，仔細而全面地勾勒出當時陳寅恪所身處的學術環境。通觀全書，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敘述了

7 榮新江，〈陳寅恪先生《陳垣敦煌劫餘錄序》讀後〉，頁 74。另譚徐鋒亦很推崇本書，見氏著，〈追尋陳寅恪的本相〉，《光明日報》，2013 年 9 月 22 日，第 5 版（書評）。

8 通過三重證據法，作者更糾正了漢文文獻中的錯誤。如他通過細讀哈佛的入學資料，指出了陳寅恪在剛到哈佛留學時的住址實爲坎布里奇鎮麻省大道 1134 號，而非如吳宓所言初住赭山（頁 22）。由於哈佛的學生資料都是當事人親自提供給校方的，故有關記錄更爲可信。

9 即便張國剛曾利用柏林大學僅餘的資料來勾勒出陳寅恪在德國時的學習情況。但由於有關資料已被燒毀，故只能對陳寅恪的德國學習經歷有一大概之了解。且他既沒有留意陳寅恪是德國東方學學會之一員，亦沒有注意陳寅恪在哈佛時的生活；而陳懷宇則補其不足。

與陳寅恪有關的西方學者的學術成就和觀點，以及當時的學術趨勢。這樣雖或予人冗長之感，卻是說明當時的學術史背景不得不用之方法，更可提示出一些重要的學術史細節，讓我們更清楚陳寅恪在西方所接觸之西學為何，乃至受到哪些人物的影響。例如，作者於第五章很詳細地交代了白璧德在當時西方學術譜系中的地位、其學說，特別是他對於佛學的看法，由此來了解陳寅恪在哈佛向他請教佛學時所談論的內容為何。

綜上可見，本書在材料和方法上都比過去研究陳寅恪西學淵源的著作有所改進。本書由此對於學界過去的觀點進行了補充。以陳寅恪史學的第二變為例，陳寅恪曾提到，自己「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故此「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於其間」。[10]余英時指出這句話的眞正意思是陳寅恪深知歐洲東方學早具規模，很難有所突破，故而另闢中國中古史的領域，即所謂從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轉治唐史。[11]然而，當時歐洲東方學到底發展到怎樣的研究高度，以至陳寅恪有這種說法？余英時在文中並沒有明確地交代。而本書第三和第四章則分別對當時歐洲的東方學學者能力以及學術趨勢進行分析。第三章觀察了當時一些著名東方學學者如白璧德、鋼和泰等人的語文水平，得出陳寅恪的語文能力並不如歐美之學者（頁 114-115）。而第四章則利用《東方學之目錄學》年刊（*Bibliotheca Orientalis*）等書目類刊物，提供一個具體的學術史語境，指出當時東方學的重點在於印度學和近東的研究，且成果頗豐，而中國學則並非主流（頁 182）。我們因而更加清楚當時歐洲東方學的境況如何令陳寅恪發出不甘為牛後的慨嘆，並誘發其史學上的第二變。

同時，本書也對舊有問題提出了新解釋。上文提到陳寅恪轉治唐史其中一個原因是他不甘為牛後，余英時亦提到陳寅恪當時可能受到王國維影響以及回應中國當時另外兩股史學潮流。[12]陳懷宇在考察陳寅恪在德國的經歷後，則指出陳寅恪這個轉變很可能是受到同在柏林大學唸書的白樂日以及日本學者玉

10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收入氏著，《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144。
11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342。
12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頁 343-351。

井是博對於唐史研究的影響（頁 90）。作者認爲二人均很均重視政治、經濟和社會、以至社會階級之關係，且注重從整個中古史了解唐史，這與陳寅恪後來治唐史之方法實非常類似。作者認爲陳寅恪很有機會接觸過他們並討論研治唐史之方法。雖然作者這裡的論述仍有可待商榷的地方，但作者從世界學術史出發解釋陳寅恪史學之第二變，誠可對爲何陳寅恪後來研究唐史會有上述所言之傾向這類問題給出一個可能的答案，引發讀者思考。

除此之外，本書亦開闢了一些過去爲人所忽略之主題，陳寅恪佛學中的文獻主義即爲一個顯例。陳寅恪鑽研佛學，非常重視對文本所見的詞彙有正確的認識。學者每謂這種態度應歸因於他所受傳統中國小學和西方歷史語言學之訓練。這點雖是無可否認，卻忽略了陳寅恪這種傾向背後的一個宗旨，即文獻本身是反映「事實」的唯一途徑。這點正是德國東方學的傳統。爲了突出陳寅恪佛學與德國東方學在這點上的一脈相承，作者在回顧了德國東方學這種「文獻式態度」或「文獻化」（Textualization）的傳統後即仔細考察了陳寅恪的佛學研究及生平行蹤，指出陳寅恪並未到過印度、中亞等地，且與歐洲學者一樣，對這些地方有一種疏離感。通過挖掘一些前人未曾留意到的問題，作者使陳寅恪的形象變得更多樣，讓我們更能了解陳寅恪的學術性格。

當然，本書並非不無可供商榷的地方。[13]首先，本書雖致力對陳寅恪的學術和當中的轉變給出新見，或補充舊說，但其中的論述仍不夠充分。箇中原因，在於作者缺少了證據說明陳寅恪學說的直接淵源。如作者指出白樂日和玉井是博很可能影響了陳寅恪的學術轉向。然而，作者已提示現在還沒有任何資料證實陳寅恪後來改變其學術興趣是受兩人之影響，而陳寅恪是否曾與白樂日見面仍成疑問，故作者非常謹慎地指出有關觀點只是假設。同樣的情況，亦見於其解釋赫爾德與陳寅恪之聯繫上（見第八章）。假設在歷史研究上固有其價值。

[13] 高山杉曾對於本書的一些錯誤內容和觀點作出修正。見高山杉，〈關於陳寅恪的幾位德國師友〉，《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2013 年 7 月 14 日，http://paper.oeeee.com/nis/201307/14/80317.html（2015 年 10 月 20 日檢索）；以及氏著，〈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搜狐歷史」，2013 年 8 月 2 日，http://history.sohu.com/20130802/n383257753.shtml。（2015 年 10 月 20 日檢索）高山杉的批評多集中於史實上的考證，而筆者則集中於討論陳懷宇論述中所遺留的問題。

如胡適所言，史家之想像力是歷史研究的其中一種方法（頁 352）。然它的漏洞是其不確定性容許他人提出一個與之相反的結論。在赫爾德的例子中，作者已指出清人章學誠（1738-1801）也有類似的說法（頁 336）。作爲飽讀四部書籍的學者，寅恪實有可能受章氏的影響。

此書亦有論證不當之處。除以世界學術史爲背景，作者亦以陳寅恪行文時運用西典一點說明其所受到之西學影響，但這個方法的成效仍值得討論。以《聖經》的典故爲例，陳寅恪雖運用當中的典故，卻未能充分說明他受到《聖經》影響。如作者所言，這似有過度闡釋之嫌（頁 128）。他事實上已提到陳寅恪只是採用拿來主義（頁 127），即《聖經》的典故與本身的想法暗合才加以引用。如他說陳寅恪在審查馮友蘭之著作時提到「以新瓶而裝舊酒」。但陳寅恪這樣做只爲了精簡語言，由此指出馮書「以新的形式來討論舊的內容」（頁 125）和批判其著作無太多新見。而作者在論赫爾德與陳寅恪之關係中亦用了同樣的方法，但其討論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而作者論陳寅恪的個人自由和脫俗諦可視爲少數主義一點（頁 423）亦有些牽強。有關陳寅恪之自由思想在過去已有一些討論，而本書亦試圖對其涵義作一解釋。但作者卻簡單地將自由定義爲對正統和主流的叛逆（頁 424）、將俗諦視爲大多數人之意見、將少數主義視爲知識人應有之個人判斷，不隨波逐流。然陳寅恪在一些議題上的立場雖與多數人有異，但我們卻不能因此斷言其自由思想是對主流意見的叛逆。且流俗是否必然等同多數之意見？陳寅恪是否認爲多數的意見一定是錯？陳寅恪所反對者事實上是錯誤，而非多數人的意見。俗諦或流俗應理解成粗疏或不正確的意見，而多數人的意見既可有不確，亦可有正確的地方。另作者謂陳寅恪所言思想自由常被人視爲批判性思維（頁 426），筆者認爲這種解讀是正確的。但作者對少數主義的解釋卻與批判性思維的意思相同。可思想自由不一定會讓人站在邊緣或非主流的立場之中。它只會讓人根據自己的經驗、判斷來找出心目中的眞理。它既可由很多人信奉，亦可爲少數人信服。

總體而言，本書在論證上雖有可商榷之處，但相對過去研究陳寅恪西學淵源的著作而言有不少突破，既能補充舊說，而有新見，讓讀者對陳寅恪有更爲立體的了解。加上考證詳實，可堪爲研究陳寅恪學術乃至西學東漸者必讀之作。